

東亞之政治與社會變動

高坂正堯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

(本文係作者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二十九日參加由國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亞洲展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

一

探討東亞之政治與社會變動時，必須共識「冷戰之結束」與「過去十多年來經濟之迅速發展」的兩項基本事實。有關前者，已經沒有再提出證明的必要。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雖然冷戰結束了，仍會維持一段時期的「二極結構」的世界政治形態。後者是人人所共認的事實，東亞的經濟急速發展的結果，使得日本、新興工業地域羣、東協國家及中國大陸等輸出總計，已超過了世界貿易之二〇%，比美國的數目多，並已接近歐洲共同市場，注意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在GNP方面，東亞雖未佔有如經濟般的比重，但是在世界貿易方面却佔着重要的地位，可能在國際金融方面也有同樣的重要性。

但是「冷戰」的結束與「東亞經濟」的成功，這二件事並不能證明，未來一九九〇年的東亞，就是和平、繁榮、安樂的社會。一個時代的結束，常帶來一些困難，人們的觀念也會轉變，「冷戰」結束時的情況，正是如此。凡是新的抬頭者必招到舊的反撥，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繁榮和安定，不容易同時出現。

二

首先，對美國而言，冷戰結束意味著美蘇對抗這樣壓倒性優先順位的比重降低，而同盟關係及國內經濟調整這樣的課題反受重視。這意味著比起冷戰時代對東亞各國的要求更為增大。一方面有別於歐洲，西太平洋並非美蘇對立的主戰場，而且因為美國在海軍方面明顯地佔有優勢，所以美國幾乎從未要求東亞各國分擔安全保障之責。雖然美國的確曾對日本提出此要求，因為與日本的經濟相比，日本所付出的安全保障費實在太少的緣故。雖然韓國是唯一的例外，但必須注意的是，這從未

成爲經濟上的重荷。

相反地，美國是此一地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剛開始是因政策刻意地，不久就不知不覺地按照經濟理論了。美國對日本及韓國的確給予極大的援助。而且，美國的市場也在東亞的經濟發展上擔負決定性的更重大任務。日本的經濟復興與重化學工業化的發展，全以對美國的輸出爲原動力。吸收半數以上的新興工業地域羣的工業製品的也是美國的市場。雖然美國在多數國籍企業中所擔負的任務有所差異，但無論如何，若沒有美國也不能有那樣的經濟成長。

但是，現在對美國而言，最大的課題是重建失去均衡的經濟，那時無論如何美國會全力更正國際收支的赤字吧！所謂無論如何，是因爲國際收支的赤字，是美國經濟本身不均衡的產物，所以對美國經濟的重建而言，專門著眼國際收支的均衡，恐怕並不適切。所以美國早晚都要面對自己的情況的，至少它目前會重視國際收支的問題。

結果，美國隨著保護主義傾向的政策，也加強了對他國市場的開放及自由化的要求。此二者互相連動，目前很難判斷比重偏於那方。從美國的經濟及社會的體質來看，後者似乎更重要。美國有普遍主義的傾向——即使使在外交方面衰弱，因爲在國際經濟方面持續不斷——若各國採用美國式制度的話，我想就會帶來調和的繁榮。無論如何，美國如此這般的要求強化，對東亞各國而言，不僅帶來了經濟問題，同時甚至也產生了心理及政治的難題吧！如同後述一般，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也許四處高漲，但或許美國的變化會給予不幸的刺激也說不定。

當然，冷戰結束所帶來的不只是負面的影響。那對東亞各國而言，在國際政治上及國際經濟上給予更大的行動自由。若是沒有冷戰結束，韓國不可能在中共設置實質上的通商代表處、嘗試與東歐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增進與蘇聯的交流等等吧。但與其說那是機會，倒不如說是誘惑且存在危險。因爲，有別於和中共的關係，韓國的「北方外交」政策既沒有產生值得一提的經濟成果，也沒有很快地帶來政治成果。相反地，外交上行動自由的增大，僅是徒然增強了民族主義。根據韓國的民意調查，喜歡美國的人民的比例，雖然可說還超過半數，但是以前的壓倒性多數已顯著減少却是其結果。

而且在東亞尚有中共存在。蘇聯的政治革新也是大改革的嘗試，中國大陸正是在相同的轉變過程上。那些並非只是虛有其表，而是真實的爲改革而努力。而且，姑且不論當初的意圖，已經不限於由上而來的改革，學生、知識份子，大眾也自發地開始行動。一九八九年舉行蘇聯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共大學生的罷課以及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興起學運，顯示了兩大共產主義國家正興起變化的重要性。

雖然如此，它不一定會成功，但是似乎也沒有所謂的「反動」，誰也無法預料將以那種方式平息下來。但可確定的是這兩國仍會持續爲大國，且那些變化將會留下相當迂迴曲折的紀錄。因此發生在中國大陸、蘇聯兩地的事件，引起東亞人們注目，人們也每每隨著事件的迂迴曲折而被動搖。雖然東亞各國的人們能夠以比較冷靜的眼光來看發生於蘇聯的變化，但關於

中國大陸則並非如此。並且中國在其人口及地方的多樣性，真有相當於羣盲摸象般的存在。在判斷的錯誤及在外交方面因應錯誤的危險性絕對不小。不過，因為二極體制的存續，外交上的運動幅度確是有限制著，所以這方面的危險性不大。但是即使在那情形下民族主義也要尋找對象。於是也會對抗原來共同利益的鄰近各國。更有可能的是，不能自由發揮的民族主義也許會內攻也說不定。

三

這是因為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的產生，與其說是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化，不如說是各國內部變化所產生的，這可說是一種密不可分的現象。當東亞各國富裕之後，人們便開始有了政治上的自我主張。日本另當別論，韓國及中華民國臺灣最近所發生的事情，無疑地就是屬於這種性質。韓國及臺灣都是自戰後四十年來為權威主義的政府所統治。這可說是爲了要運用「哈秀滿」所謂的「後發性的利益」所必要的吧。爲了要近代化，以資源分配爲重點，爲了要走捷徑起飛，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但是，到了某種富裕程度時，國民便無法忍受權威主義政府。而且完成起飛以後，到了必須用更高的技術來達到成長階段時，權威主義政府便有負面影響。那時由於產物的品質成爲問題，人們必須花心思在創新上，於是事事要管的權威主義政府就成爲一種障礙。

但是這種轉變確實不容易。握有權力者即使是一部份權力也不願放手，這並不僅是由於權力慾望，也是由於一份責任感所使然。相反地，國民和在野黨也一定有所變化，這也是很困難的。他被指導，有時習慣於唱反調，却遲遲未能走向以負責的態度提案，成爲統治者。因此雖然和緩地實施民主化比較好，但若一考慮到事物變化趨勢的必然性，這樣也不容易。想推動民主化的人便急欲推動，若未見政府做充分的讓步，他們不但不能滿足，還會抗爭。突克皮兒說過：「當權威主義政府做了讓步時，最初人們的不滿會增加，更容易發生革命。」這個叫做「期待增加所導致的革命。」不過，若完全沒有一絲危險性，民主化則無法推動。

這一兩年韓國的政治，正證明了從權威主義脫離的困難。客觀地看來，韓國的政治起了很大的變化。不僅是在建國後首次和平地轉移政權，國民也獲得了選擇政權的機會。同時，種種政治統制，言論自由的壓制也被改正。可是激烈的政治運動未停，在野黨並不一定是負責的。其實，在野黨的立場也很困難。若他們站在負責的立場的話，從反對權威人士——過去的支持者看來，簡直是一種背叛。

而且，一個國家並非孤立地存在，它必須對外保持關係。民主化則與民族主義息息相關。在國內所謂的自我主張，相關

之事全由自己決定的精神，往往在國際間被認為「他們事事都想自決。」韓國政治之所以困難，乃和它在國際地位的困難有所關連。修正南北分裂的局面，至少使情勢緩和是極其自然的感情。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想獲得一點成果也是困難的。

而且也有更基本的理論上的問題。也就是，在國內的民主化雖朝向多元主義，但外交則是以國家為單位的一種集權式作用。故不論是絕對主義政府或權威主義政府來做也好，或者以國民之名義做也好都是一樣的。因此初期的民主化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便容易導致了盧梭式的代表全體意思的政府的出現。若要暫時不提外交而專心致力於經由法的程序統合國內的多樣性意見的話，必須有好狀況與卓越的睿智。

由於臺灣在國際政治上，實在有太多的困難，因此也許可以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避免如上述的危險。想要單純地用「統一」、「獨立」口號來解決臺灣在國際政治地位上的難題的人，真是最糟糕的煽惑家了。也就是說，臺灣因為有困難所以不易被煽惑。有這樣的理由，所以從一九八七年七月解嚴以來，臺灣的政治發展和穩健。新政權成立後，雖然檢審尺度大幅放寬，政治活動也自由起來了，但是沒有發生過暴亂。這只意味著權威主義制度之廢止而已，民主化的積極措置——議會的技能如何給予？如何構成？如何選出議員？均未著手研究實施。臺灣政治體制應如何？也尚未明示。我認為不必要急著先提出口號或構想，倒不如用建議方式較為妥當，但政治總是在加速變動的。問題是到了那時或在那時以前，是否能醞釀出獨自的政治思想才是重要的。

就日本而言，政治體制也一直是個問題。話雖如此說，但問題的本質有所不同，即是在高度工業國家中統治的可能性的問題。如舜配大所指出：「資本主義乃是逆說的存在。」那是因為貴族在以往是由政治階級的人所建立的結構中成立、成長，對資本主義而言，他們的存在有必要同時也是一種阻礙，所以資本主義的成長導致政治階級的衰弱及破壞。戰後日本經濟成功的不少原因是由於戰敗及占領改革，使權威主義政府消滅之故。不過這也使得政治階級變弱。剩留下來的官僚制度甚而被強化，但仍未能成功地建立一個具有責任感及威信的新政治階級。而且，既然國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這樣的情況便無法持續很久。假如政治家的評價比起官員或實業家為低，如此也不妥當。瑞克魯特事件，基本上就意味了這個危機。

另外，官僚作風太強硬的話，會加強經濟的規制或指導等要素，被很多外國人所批評。也就是說，日本在目前體質的運作方式上，並不能將巨大化的國際關係讓世界的人們了解。日本被稱為「政治小人」，又被批評為「保護主義」，這都是由於政治階級衰弱之故。這種情況無法輕易的改變，但也無法保持現狀。因此，今後日本政治混亂，領導力低落的可能性不小。

如此看來，各國情況均有所迥異，而東亞各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能否在不同的情況下有適合的政治，我認為在沒有混亂之下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

話雖然如此說，東亞各國社會的安定性仍算高。舜配大提出資本主義的另一異論。他認為人類不可因為受到地緣、血緣的限制就成爲一個動彈不得的東西。然而已被「原子化」了的個人並不以身爲資產階級而帶給資本主義興隆。舜配大非常重視所謂的「家族動機」。因此他認爲「資產階級」即指基於家庭而形成其看法與動機，並且是爲了妻子、兒女而工作儲蓄的人而言。然而，因爲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所造成的經濟集中化，家族企業衰退，房屋、土地、生產機器等固定資產轉換爲股票、證券等流動資產的緣故，企業家的心理狀態也產生變化。而且，隨著家族動機而引起的推動力，實業家的時間的視野，縮小爲只顧自己的一生。如此的話，他們不會像以前那麼熱衷於賺錢、儲蓄、投資等機能。

美國社會學家倪蘇別都指出，這即是美國所發生的儲蓄過少現象的原因所在。相對的，西太平洋圈的經濟活動力之所以那麼強，主要是因爲他們有肯爲未來犧牲的動機及規則。就吾人所知，這種理論正是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所作的最正確的見解。根據統計顯示東亞各國的儲蓄率的確很高，也因此而產生投資，帶來經濟成長，但儲蓄率高的原因，並不能以經濟的因素來說明。

這個本質，至少持續一段期間。這是因爲爲了未來，而把現在做某些程度之犧牲的態度使然，在某些時候，仍會對未來產生些不安。而且西太平洋周圍的各國，對於將來想求得安逸，目前都還太過脆弱。而且在人們的倫理律中仍存在著這種本能上的感覺。人們對農業或中小企業的關心，遠比經濟合理性強烈，則可以證明這一點。

但是，問題仍很多。第一有國際性問題。由這些人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因爲產生貿易收支上的盈餘，其他國家便會要求貿易自由化。而農產品的輸入自由化，流通過程合理化等要求，從經濟合理主義的觀點來看，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却造成家族企業衰退，甚至崩潰的地步。基於此，人們便強烈地加以反對，然而爲了能在國際經濟之中生存，也就不得不適應了。而保護主義遲早會遭到淘汰的。在此種情況之下，構成人們工作、賺錢、儲蓄原動力的倫理觀，是否可以不受到重大的傷害呢？

第二、爲了避免出現貿易盈餘，或爲了減少貿易盈餘，必須刺激國內需求。不過，若只單純地把消費當作美德，也許將會認爲人們眼光短淺，也將不當地減少對未來的犧牲。但，是幸或不幸呢？東亞各國的人們能夠投資於社會投資不完備的環境，所以或許問題就在於要如何去籌措這筆資本上。

第三、東亞各國勢必會進行海外投資，因爲假如決定實施自由化，刺激國內需求，也許可以獲得相當大的國際收支的盈餘。因此東亞的人們就須和不同價值理念的人接觸，一起工作。這個正是一個成長的機會，不過同時也是經濟上、文化上、

社會上摩擦的原因。甚至還可能使自我的價值觀往不好的方向變化。

要將東亞諸國賦予特徵，最大者並不是其經濟發展的快速。而是更重要的使社會安定、繁榮的態度與價值體系。但這些並非恒常不變的，有可能變好也有可能變壞。若朝不好的方向變化的話，不但會造成漠不關心、眼光狹小症，甚至還會形成愚昧的國家主義。

五

以上的課題要在國際上做到實在不多。成敗均與各國的政治、社會有關。但是緩和地解放性的國際交流的方式，極有效果也很有必要的。因為它可以擴大行動範圍，增廣視野。「家族動機」雖然不錯，但因為太狹窄，所以有必要努力，將其擴大。這樣做也可以避免落入民族主義的愚昧中。努力合作就是防止對立的最好辦法。因為人類具有一種不互相合作的時候，不但不能中立，而趨向對立的危險性格。

亞洲、太平洋圈的各國的規模、政治體制、經濟富裕、法律地位等各方面均有所異，尤其是要考慮到各國間摩擦原因的時候，更需要重視上述的課題。就是因為這樣的理由，那些方式必須採用緩和而開放的途徑進行。

*

*

*